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清〕成鷺和尚 著

曹旅寧 蔣文仙 楊權 仇江 點校

廣東旅游出版社

咸步堂集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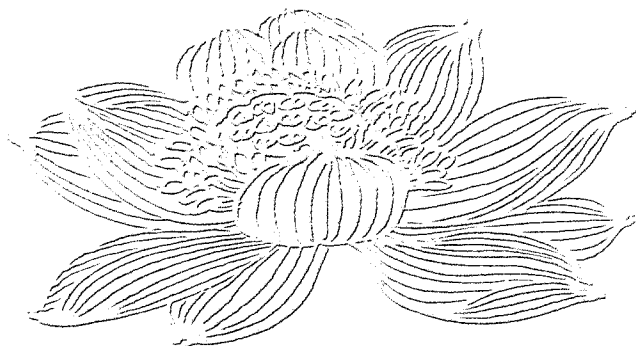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清〕成鷲和尚 著

曹旅寧 楊 權 點校

咸陟堂詩集

丙戌陳永正敬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咸陟堂集/[清]成鸞和尙著. 曹旅寧 蔣文仙 楊 權 仇 江 點校.
廣州: 廣東旅出版社, 2008.8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 (咸陟堂集)

ISBN 978-7-80766-006-4

1. 咸… II. ①咸… 2. 曹… ③ 蔣… 4. 楊… ⑤仇…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J26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74678 號

責任編輯	梁 堅	徐鏡昌	封面設計	方楚娟
責任校對	馬德鴻	責任技編	盧宗廣	
出版發行	廣東旅遊出版社			
聯繫電話	(020) 88326881			
傳 真	(020) 87347871			
地 址	廣州市中山一路三十號之一			
郵 編	510600			
圖 書 網	www.loupre.com			
印刷者	東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廣東新華發行集團			
版 次	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版			
規 格	二〇〇八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張	八五〇毫米×二六八毫米 三十二開			
字 數	八九六千字(共三冊)			
	定價 一三八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寄回出版社調換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編委會

顧問

黃國聲

陳永正

蔡鴻生

段曉華

編委

仇江

李福標

鍾東

楊權

馮煥珍

李君明

景山先生

李桐

趙是儒趙梁趙是
僧趙安趙是夷趙
是惠監平葛任趙
是田山平可森王
平可多王

陳鶴白題

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總序

蔡鴻生

嶺南佛門是中國佛教的濱海法窟，名剎林立，高僧輩出。歷代的大德上人，繼承了『以華情學梵事』（宋釋贊寧語）和『以忠孝作佛事』（宋釋宗杲語）的優良傳統，在人間化的實踐中發揚高風亮節，光耀鄉邦，垂範後世。

明清易代之際，社會動蕩不安，禪林也風起雲湧。《遺民所知傳》早已指出：『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夜浮屠，以貞厥志。』甲申（一六四四）之後，男女遺民逃禪成風，逐步形成愛國愛教的三大中心：江南有蘇州靈巖寺的弘儲法師（一六零五至一六七二），滇南有鷄足山的擔當法師（一五九三至一六七三），嶺南則有海雲寺的天然法師（一六零八至一六八五）。後者將弘法護生與忠孝節義結合起來，言傳身教，不遺餘力，成為十七世紀嶺南佛門的精神領袖。在天然法座周圍，集結着大批志士仁人式的社會精英，他們的死生去就和翰墨詩文，使濱海法窟放出世紀之光，與唐代曹溪道場的興起前後輝映。

清初嶺南佛門的歷史地位，是由亦儒亦禪的高僧群體奠定的。他們的功業和智量，超越群倫，值

得後人景仰和追思。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在《鮚埼亭詩集》中，已評價過嶺南遺民僧的事迹。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也在其名著《柳如是別傳》中，對剩人（函可）和尚的冤獄作過詳確考釋，使嶺南僧史與『明清痛史』連成一體。一九八六年，趙樸初先生的粵游雜咏，感慨更深。其《題澹歸禪師詩卷》云：『跣足蓬頭執役勤，猶憂衣食累乾坤。半衾半鉢冷兼餓，詩卷長常血性人。』另一首《訪丹霞山寺，贈本煥和上》云：『群峰羅立似兒孫，高坐丹霞一寺尊。定力能經桑海換，叢林尚有典型存。一爐柏子參禪味，七盃松濤覓夢痕。未得篇行堂集看，願將半偈鎮山門。』趙詩從丹霞望叢林，歌頌了澹歸禪師的『血性』和『定力』，實屬發潛德之幽光。透過歷史的迷霧，可知包括《徧行堂集》在內的僧徒著述，凝聚着豐富多彩的因緣：佛緣、世緣、學緣和翰墨緣。這批歷劫幸存的嶺南僧寶，不僅是『桑海換』的歷史記錄，也是『典型存』的文化象徵，非同凡響。如果讓其塵封、蛀蝕和流失，就未免有負如來了。

爲了保存這批史料，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組織以廣東高校教師爲主的各界人士，多方收集，編纂整理《清初嶺南佛門史料叢刊》。香港潘郁文（躍雄）先生慨助有關費用。先生多次資助嶺南佛門文史整理出版，志行可風。如今這套叢刊正在整理並已由佛界人士籌資開始出版。這項嶺南佛、學兩界共建的文化工程，堪稱盛世勝緣。它的問世，必將促進佛門的人間化和學術的高雅化。讓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精神鼓舞下，進德修業，儒釋齊輝。

二零零四年九月謹序

於中山大學永芳堂

成鷺及其《咸陟堂集》

姜伯勤先生曾指出：『在嶺南，突出反映禪寺名僧士人化趨向的有天然系禪僧與蓮社系禪侶，以及鼎湖山系禪僧及東林社系禪侶。』⁽¹⁾而曾在香山建立東林庵並仿明東林黨故事結社，又曾擔任肇慶慶雲寺第七代方丈的成鷺，既是鼎湖山系也是東林社系禪僧的代表人物。這位在清初嶺南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就是《咸陟堂集》的作者。

成鷺俗姓方，名顥愷，字麟趾，廣州府番禺縣韋涌鄉人。其父方國驊（字楚卿，號騎田）是當時地方上的名士，曾中過南明隆武朝的舉人，清朝征服嶺南後歸隱林下，以硯耕糊口，學者稱學守先生。其母蘇氏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居士，曾受優婆夷五戒。其從兄方殿元（字蒙章，號九谷子）是清康熙進士，工詩文，為『嶺南七子』之一。

成鷺出生於明崇禎十年（1637）三月二十一日，九歲就外傳受詩書之學。他天性聰慧，卓犖不凡，有『神童』之號。十三歲時曾出應南明永曆朝童子科試，被錄為博士弟子員。若是在清平世界，成鷺也許就循著科舉之途一路走下去了。然而他生不逢時，其少年時代恰是南明與清朝在南方激烈角力的時代，廣州地區曾發生了一系列令人驚心動魄的事件。先是清順治三年（1646）清撫軍佟養甲、督師李成棟潛師攻入廣州，南明紹武帝自經。接著『廣東三忠』——順德陳邦彥、南海陳子壯和東莞張家玉揭竿而起，這場最終被血腥鎮壓的起義拖住了清軍西進的步伐。順治五年（1648），李成棟出人意料地脅迫佟養甲反正，宣佈兩廣反清復

明，南方形勢一時變得有利於永曆。順治七年（1650），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師南下，在打敗了李成棟之後，圍城八個月，最終攻陷了廣州。清軍一連屠城七日，造成六十餘萬人死亡，在城男子靡有孑遺，是為『庚寅之劫』。方家在這場驚天動地的大事變中也遭受了很大的劫難，方國驊為營救陷於城中的眷屬，不得不向清軍輸餉二千餘金。這筆數額巨大的贖金使方家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面對生計蕭然之局，成鷺祇好輟學耕稼。那時成鷺年少氣盛，喜任俠，『見獵心動，日與鄉里惡少交遊，舉重扛鼎，運槊試劍，橫行市井，莫敢誰何。……出遇不平，奮臂而起，鋤強扶弱，不避權貴，敬賢疾惡，不擇親疏』。不過到十七歲時，他又恢復了向學之心，取出家藏舊籍日夜攻讀，在自學中『盡棄制科業，力究濂、洛、關、閩之學』^{〔二〕}，『攻苦逾年，經學淹貫』^{〔三〕}。為了糊口，他十九歲出為塾師，從此開始了斷斷續續長達二十餘年的教學生涯。在教書的同時，他繼續刻苦自修，學問日漸博洽。這個時期的成鷺，以『晚世之真儒』自任，立言設教無不以儒行為務，『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但當時『大江以南阻於聲教，四方不軌之徒相繼蜂起，嶺南山海半為嘯聚之場』，動亂的社會現實與成鷺美好的道德理想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

如果說成鷺在前半生中留給世間的是一位為淳民氣、化風俗而孜孜以求的儒生形象的話。那麼他在後半生中所留給世間的，則是一位矢志皈依三寶卻不脫士人習氣的方外遺民的形象。他在初逾不惑的那年，也就是康熙十六年（1677），忽然自我斷髮，宣佈離俗。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成鷺出人意料地放棄多年所持奉的儒家價值觀而遁身佛門呢？這是一個曾令學者疑惑的問題。^{〔四〕}對此成鷺並未正面回答過，他只是在其自傳《紀夢編年》中說自己與佛門向有『夙緣』，因為其母在生他前夕曾夢『老僧入室』。另外，成鷺還提到母親崇信三寶，一生焚修不斷，這種敬佛態度對他产生了影響。是不是這些因素就足以使成鷺出家了呢？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仔細析讀《紀夢編年》，會獲得

某些有意義的信息：

是時，丁巳歲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聞變而起，仰天大笑曰：『久矣夫，吾之見累於髮膚也！』左手握髮，右持並剪，大聲疾呼曰：『黃面老子，而今而後，還我本來面目，見先人於西方極樂之世矣！』

『聞變而起』四字，透露了成鸞的出家與當時政局有密切關係。成鸞所說的『變』，是指三藩之亂被平定、清朝重新克服南方。康熙十二年（1673）清廷宣佈撤藩，握有重兵的平西王吳三桂與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繼茂相繼拒命，史稱三藩之亂。這一事件在性質上本是地方割據勢力與中央朝廷之間的利益爭鬥，但是由於為首的吳三桂是打著『興明討虜』的旗號與清廷對抗的〔五〕，因此使當時不少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大明江山恢復可期。成鸞雖未像大名鼎鼎的屈大均一般興沖沖地離鄉從軍，但其內心對三藩的前途是充滿期待的。然而經過四年的政治與軍事較量，『滇黔之炎炎者，將見撲滅；閩廣之滔滔者，漸覩安瀾；冠冕之峨峨者，又不免於裂冠毀冕，退修初服矣』。這個結果，無疑給成鸞潑了一頭冷水，並最終促成了他離俗。所以與成鸞同時代的李來章這樣分析：『意其人固豪傑倜儻之流，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乎？』〔六〕從表象來看，成鸞出家似有心血來潮的意味，其實不然。胡方《跡刪和尚傳》謂成鸞年『十五遭時變，飄然有出世想，以親在未獲如願』，可知他早有離俗之念，祇不過是由於『親在』而未能付諸行動罷了。到康熙十年（1671）方國驊辭世，道路就差不多鋪平了。其父故後，成鸞『出家之念更切』，而其母正崇信三寶，成鸞『一請得命，遂決志薙染』〔七〕。

自我落髮後的成鸞最初在廣州府南海弼唐的亦庵自修，由來又寄跡於其老友陶握山在小漫山的別業。他的奇特出家方式曾惹來人們的恥笑，儘管他在與時僧辯論時曾理直氣壯地以『師心』來回擊對方的

攻擊，但是作為一個出家人，『無師無名，且無戒體』，無論怎樣總是說不過去的。好在過了不久這種尷尬局面便告結束了。康熙十八年（1679），臨濟宗高僧離幻元覺入雲門掃祖師塔，與成鷲邂逅於小漫山，二人一見相契，遂成師徒。離幻元覺是羅浮山石洞禪院的方丈，號石洞，是被清順治帝賜號『弘覺國師』的嶺南明僧陳道忞的徒孫，因此成鷲在法脈上屬天童系^(八)。元覺原本為他取法名光鷲，字即山；後因平陽祖派^(九)易光為成，光鷲遂易名成鷲，改字跡刪（跡刪就是『刪除形跡』的意思），號東樵山人。

初受石洞法的成鷲最先在西寧（今郁南）主持翠林僧舍，當時西寧有『僧海』之稱，高僧鼎峙角立，應求相望，其中以雲窩山的仲介禪師、龍華寺的無盡禪師和石門梅坪寺的傳源禪師最為著名。成鷲在此地，不時向這些高僧問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與湛茲傳源這位後來任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三代住持的高僧的交往。傳源是南京天界寺覺浪道盛的法嗣，在宗派上屬洞上正宗天界系。傳源早年曾參遍諸方，學問淵博，禪理精通，四方學者多從之遊。成鷲相見恨晚，乞為門人。但傳源以成鷲乃非凡大器，堅辭不納，三請三卻。此為清初嶺南佛教史上的一段佳話。成鷲在西寧盤桓數月後，於康熙二十年（1681）回廣州禮其師於華林寺（其時元覺正任華林寺第二代住持），稟受十戒，隨即遵師命入羅浮山，掩關於石洞禪院，耕鑿之暇，日夜參究佛法，漸有所悟。不久元覺圓寂，合眾共推成鷲繼主華林寺法席。當時華林寺正為『魔外所侵，莫可搖拔』，成鷲毅然入院除莠安良，立規垂訓。『微師，則堂堂寶剎化為狐兔之窟矣』^(十)。然而由於元覺生前曾有『子性稟孤高，不能容物，出則恐為眾的，祇可住山，不可為人』之囑，所以成鷲未就任方丈之職，而舉師叔鐵航和尚自代，在整頓好寺院之後就返回了羅浮山。

偏僻的羅浮山雖宜於禪修，卻不是世外桃源。尽管成鷲在人石洞時曾指江而盟：『此去大事不明，生恩不報，誓不復過此河！』但是他在山上呆未及一年，便狼狽地逃下了山，因為盜賊之嘯聚搶劫與官兵之

狂捕濫殺使他無法安生。飛錫出山的成鷺希望尋一個『無賊無兵無名之地』托命，他聽說海南氣候溫暖、民風淳朴，便倏然浮海，來到了當時大陸人氏罕至的海南島，托跡於會同縣多異山海潮岩的靈泉寺。在海南呆了兩年之後，他又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返回大陸。久客初歸的成鷺身如飄葉，心若懸旌，正當世路茫茫、未知歸定的時候，他在華林會上聽說有一位閑雲禪師得法於天目，便前往拜訪，請受具足戒。為了參通佛理，同時也為了趨避風鑒家所預言的『大難』，受具後的成鷺在故里閉關三年，通過這種強化修煉達到了大自在。出關後，成鷺結庵於南海的馬山之陽，與一群貫通三教、博極群書的友朋組建了一個文化學術團體——『蓮社』。過了一年餘，他受閑雲和尚之招到佛山仁壽寺，任書記，後任首座。康熙二十九年（1690），成鷺辭去了在仁壽寺擔任的職務，到香山（今中山）鐵城建立了東林庵，並仿晚明東林黨故事結社，入社者共有僧俗三十餘人，俱為聲應氣求、志同道合的清流。成鷺在東林庵五閱寒暑，時與社員聚會酬唱，活得頗為自在。

康熙三十四年（1695），成鷺應澤萌今遇和尚之邀，北上仁化丹霞山，客居於別傳寺。澤萌是清初嶺南遺民的精神領袖天然兩是禪師的第八法嗣，於康熙二十五年至三十五年（1696-1696）主別傳寺法席，澤萌在法脈上屬曹洞宗，成鷺在法脈上屬臨濟宗，二人雖宗派不同，但相處得十分融洽，『主賓之投契者，有生未曾有也』。成鷺本以為『幸丹霞之有人，可藉以休老矣』，想不到在他上山次年其母便辭世了，他祇好返回番禺儘孝。待他辦完喪事返回丹霞，今遇已往匡廬主法棲賢寺。成鷺與繼席者合不來，遂離開別傳寺，先是寄跡於山麓的錦岩寒梅古寺，後應肇慶鼎湖山慶雲寺第四代方丈契如元渠之邀到肇慶修纂《鼎湖山志》。修志工作告一段落後，他以舊社難忘，辭返東林。在此期間，他曾到過澳門的普濟禪院活動。在重返東林的兩年中，成鷺大病了兩場，幾致喪命。待身體稍為恢復後，他返回廣州，後養疴於其早年的出家之地弼唐亦

庵，後又借居於龐氏的梅園。

康熙四十年（1701），成鷺受請入主座落在廣州珠江南岸、距省會約十里的大通煙雨寶光古寺。此寺本建於南漢，規模宏大，但至明萬曆時已廢毀。入清後曾有善士捐資興復，惜乎事未竟而人先卒，寺廟復將廢墮。成鷺入院後，日督徒眾補葺破漏，終於使古剎恢復了舊時模樣。成鷺總共在大通古剎生活了七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鼎湖山虛席，成鷺應合山大眾之請入山主法，成為慶雲寺第七代方丈，當時他已經七十二歲。慶雲寺以開山日久而弊端叢生，成鷺主法後目擊頹風，痛心疾首，遂立規矩，定祖訓，大刀闊斧地整頓寺務。成鷺經營慶雲寺長達六年之久，對寺廟的建設做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編纂完成了《鼎湖山志》。但是，其『不能容物』的性格招致了寺僧的不滿。康熙五十三年（1714），面對橫議奇談風起的局面，成鷺宣佈退席，還居廣州大通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月初，成鷺患了痰氣疾，不食十餘日，而對客談論如常。二十一日，呼眾詳囑後事，又口授封龕偈及封條稱呼，讓門人逐一記下。待一切吩咐完畢後，他平靜地說：『我七日復來，有話與汝輩說。』言畢而逝。這位嶺南佛門的曠世奇才，走完了其人生的歷程，世壽八十六，僧臘四十五。（十二）

因為成鷺在其盛年時到過海南島，後來又到過澳門普濟禪院，所以近代學者鄧之誠認為他有『通海』——即秘密聯絡海上反清勢力——的嫌疑（十三），此說影響甚大，幾成定讞。據筆者看來，這不過是捕風捉影而已，並沒有事實根據。（十四）不過，從《咸陟堂集》所收的某些詩文及《紀夢編年》所載的某些事實來看，成鷺在內心深處對以異族入主中土的清朝統治者是持排斥態度的，對明朝的天下是懷有留戀之情的。因此，有無現行反清活動，都改變不了他是袈裟遺民的事實。

成鷺學問博洽，才氣縱橫，一生著作頗豐，見諸著錄或尚存世的作品有《楞嚴直說》、《紀夢編年》、《金

剛經直說》、《老子直說》（或作《道德經直說》）、《注莊子內篇》、《鹿湖草》、《詩通》、《不了吟》、《自聽編》、《鼎湖山志》、《漁樵問答》，以及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部《咸陟堂集》。

《咸陟堂集》是成鷺的詩文合集，分初集與二集兩部分。初集包括文二十五卷、詩十七卷；二集包括文八卷、詩六卷、賦一卷。^{〔十四〕}對《咸陟》一名的來歷，《紀夢編年》有如下解釋：

《周禮》太卜氏占夢之法，其夢有三：因思慮而致者曰致夢，思慮所不及者曰綺夢，無思無慮感於物而通者謂之咸陟之夢。吾少也賤，多能鄙事，學為詩文，本乎家學，不由師說。著述經論，自成一家人之言，不敢出以問世，恐見笑於大方。竊念萬法惟心，我無心而感物，物將從吾心以應之，咸陟之謂也。遂自名其堂曰《咸陟》，著述因而名焉。

此書收錄了成鷺在一生的不同時期所作的序、跋、誌、銘、記、傳、啟、疏、引、賦及祝壽、祭祀、題贈、書牘、問答、警語、題辭等共數百篇，詩歌一千多首。這些形式不同而內容豐富的作品，從不同角度記錄或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立場、思想傾向、生活態度、藝術見解、審美意趣、宗教信仰、處事哲學以及社會交往情況，包含了其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諸多方面的信息，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歷史價值。例如，集中所載的僧人傳記、寺塔碑銘、書信尺牘以及有關諸山形勝的文字，便是研究明末清初嶺南佛教史的珍貴資料。像文一樣，成鷺題材廣泛的詩作亦是証史的重要素材。例如《仙城寒食歌》之四，描述了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陷廣州後「海珠海水流腥血，十萬生靈冤莫雪」的悲慘局面，揭露了清廷血腥屠殺人民的罪行。又例如他在澳門的吟詠是研究澳門社會狀況的第一手資料，像《三巴寺》這樣的詩，活脫脫就是當時澳門社會的掠影。其《觀李雪樵明府新制龍尾車圖式，述為長歌，寄邑明府姚齊州，冀廣其傳》有「曾聞西洋利瑪竇，師心巧過公輸般。制器尚象無不有，玉衡平衡渾等閒」句，反映了明末西方理論與技術在中華

傳播的情況。成鷺本人在書法繪畫藝術方面有很深造詣，是嶺南的名家，因此收入集中的題畫詩，是研究清初嶺南書畫史的有價值的素材。

《咸陟堂集》不僅對於研究明末清初嶺南的歷史具有價值，它本身也是文學雅苑的奇葩，在清初嶺南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成鷺學問淵博，極富才情，其文學才華向來備受論者推崇。胡方在《跡刪和尚傳》中說：『大抵其才，以敏捷雄浩推倒一世，藝苑之士無與抗衡者。』沈德潛則言成鷺『所著述皆古歌詩雜文，無語錄偈頌等項，本朝僧人鮮出其右者』^{〔十五〕}。從收入《咸陟堂集》的作品來看，這些評價應非過譽之辭。成鷺為文筆力縱橫，直抒胸臆，有一股浩盪之氣，『盡情發洩，不拘守八家準繩，頗有似莊子處』^{〔十六〕}。例如其《南華問答》以佛說道，極言『逍遙』之義，汪洋恣肆，極富辯才。《菊說》狀寫菊花名品『一捧雪』之玉質冰姿、冷魂皓魄，文采飛揚，落英繽紛。《會祭陳獨漉文》把陳恭尹屠殺獲存、南明任官、草澤苦學、渡嶺北遊、閉戶著書等經歷都說成是『造物主』的意志體現，立意奇特。在《咸陟堂集》中，還有一類幽默輕鬆的作品，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例如《石癖記》記述名士鄭露以美姬換奇石、作者自己把『似我』的頑石視作寶貝的趣聞，把癖石者對石之『癡』描寫得活靈活現。《與友人》拿《宋史稗鈔》所記的一隻『屢遊相鬚，曾經御覽』的蝨子來作遊戲文字，令人忍俊不禁。甚至在囊中羞澀、生計無著之際，成鷺的文字也不失其風趣幽默，相信讀過其《借筆》、《借米》、《借錢》一類文字的讀者，都忍不住會發出會心的一笑。

成鷺詩歌創作方面的成就也不在其文章之下。其古體豪邁奇崛、曠達浩盪，近體則凝煉清切、頗饒高致，顯示了超群拔俗的藝術功底。樊澤達《咸陟堂詩集序》曾把成鷺比為古代的文暢、高閑、惟儼、秘演一類人物；鄧之誠則說成鷺之詩『快吐心臆，不作禪語，無雕琢摹仿之習，仍是經生面目』^{〔十七〕}。的確，成鷺的詩作或意度閒雅，或鬱律有神，非一般作手所能望其項背。例如，『其寫景則模山范水，往往如泉噴珠，著壁

成繪，清奇而不失自然。『十八』像《飛水潭觀瀑》以飛花飄雨與萬壑奔雷來極言『飛水』之動，又以石乳之新與莓苔之古來極言澄潭之靜，動靜相映，繪形繪色，意趣盎然。

成鷲詩文出眾，其詩文理論也自成一說。他在《藏稿自序》中說：『自為詩文，無所取法，第惟根於心，出諸口，發之而為聲，歌之詠之，自適其情而已。』有本於從心適情的宗旨，他對那些出自真情至性之作總是給予高度肯定。例如，《九帶堂詩跋》稱讚天藏禪師『假聲律以舒寫其性情』，《缶鳴草序》褒揚龐子『當其患難時，舒其牢騷憤懣之氣，出為不平之鳴』，《紀遊詩序》自論作詩之旨是『足之所至，興之所寄，即事遣情，往往有詩，不復計其工拙』。這種見解既系出自禪家『明心見性』的意旨，與中國詩文理論的傳統也保持了一致。重視真情直抒，必然強調寫詩為文以自然為本。在成鷲看來，詩文創作是作家與自然渾合為一的過程，自然有待於作家的創作而熠然生輝，作家的創作則有待於自然的豐富而蔚然成文。其《鼎湖山志·藝文碑碣》說：

蒼松古柏，文之質也；黃花翠竹，文之華也；響泉幽磬，文之韻也；雲蒸霧蔚，文之態也；淵停岳峙，文之正也；奔雷勺瀑，文之奇也。天地有自然之文章，目遇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意遇之而成理，神遇之而成形。名山非作者無以寫其真，作者非名山無以成其文。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成鷲還繼承了肇自東晉、經唐宋而在宋末嚴羽《滄浪詩話》那裏獲得豐富的以禪喻詩的理論，並在前人基礎上進行了發揮。其《陳伯雲詩草序》便是以禪史喻詩史，以禪品喻詩品，以禪宗五家的宗風比附詩家諸派的詩風。他在《浪錫草序》中借用了中國畫學的『真』、『妙』、『神』三品說，認為『真品為骨，妙品為髓，神品為神，出之以遊戲三昧，雖日吟詠風雅煙霞之場，不自知其為詩與道也』〔十九〕。

《咸陟堂集》最初由《耕樂堂》刊刻於清康熙年間。成鷲在《咸陟堂集》自序中提到：『東樵老農日以穉